

投稿類別：專題文章

關係也是防災的基礎設施：臺日地方實踐、田野觀察與學生學習

林怡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兼任助理教授 yitzu0830@gmail.com

一、臺日聯盟開啟的機會之窗

2024 年，在臺中舉行的第六屆臺日聯盟「新實踐」研討會上，我第一次遇見高知太平洋學園的伊藤創平老師（以下簡稱伊藤師）。我的報告結束後，伊藤師走來與我聊天，我們從各自關心的防災議題談起，直到會場熄燈、工作人員開始整理空間，才發現已經過了將近兩個小時。前往晚宴會場的車程中，對話仍未停下。誰也沒想到，這段相遇後來會成為一條連結埔里與高知、持續延伸的防災教育交流之路。現在回頭看，也許是因為彼此都帶著尚未解決的地方課題。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所在的埔里，是九二一地震的受災地。對我而言，九二一從來不只是研究與課堂裡的一段歷史。我因親友在地震中離去，也走進防災教育。這些年來，我思考著，當親身經歷過九二一的一代逐漸老去，學生也都在九二一地震後出生，這些對他們來說是歷史。那麼這個地方曾經受災經驗與故事，累積的知識與彼此照顧的經驗，能如何走進下一個世代？

高知面對的是另一種災害時間。日本許多防災教育，是從經歷過重大災害的地方發展出來的，如神戶與東北；高知面對的，卻是週期將至但尚未到來的南海海槽巨大地震與海嘯。埔里思考的是，如何讓已經發生的災害不只成為歷史；高知面對的，則是如何讓尚未發生的災害被理解，並使準備在災害到來以前開始。

伊藤師說：「太平洋學園是在災前進行防災專門學習的學校」，這樣的背景形成，也是因為學校的特殊經歷：主要陪伴有不登校經驗的學生，或需要不同學習方式的孩子。他告訴我，防災是一個很適合讓學生參與交流的議題。這句話讓我一直記得。防災不只是在教地震、海嘯與避難，也可以讓孩子與別人合作，重新走進學習，並發現自己不是什麼都做不到。伊藤師畢業於高知大學。雖然是大阪人，後來留在高知工作。我們的合作也連結到高知大學大槻知史教授，以及本校科技學院陳皆儒院長、土木系與人社中心。但這些不是在第一次就說好的，而是在一次次對話、互訪與回應學生需求的過程中，慢慢走出一條臺日防災教育交流的路。臺日聯盟為我們開啟的，不只是一場會議裡的相遇，更像是一扇窗，讓埔里與高知各自帶著的問題，可以從窗的兩邊互相看見。

二、從日本回看臺灣：人類學如何成為防災的觀看方法

我從事防災教育近十三年，土木系的訓練，讓我認識工程的技術與方法，試著從土木的角度看事情；而人類學則提醒我，防災所面對的從來不只是災害

本身，而是生活在風險之中的人。2025 年 2 月，我第一次參加高知大學舉辦的 Spring School。那是一場以具海嘯高風險的高知須崎地方為田野的工作坊，當時我帶著一位修習我通識課程的學生參與。

在那裡，我看見這場工作坊如何連結地方政府、當地不同的學校，我也看見，持續辦理工作坊，能為地方帶來不同的思考與觀點刺激。不同國家、學校與專業背景的人走進來，討論地方問題，也一起想像可以做些什麼。不同國家、學校與專業背景的人走進來，談地方的問題，也一起想像能做些什麼。工作坊最後，大概老師請我給學生一些綜合建議。我把自己逐漸形成的研究方法整理成三句話：

Be an Insider-成為局內人。

Be an Outsider-再成為局外人。

Do What You Can Do-做自己可以做的事。

成為局內人，是願意靠近地方，不急著帶著答案進去，而是先理解人們如何說話、感受當地的時間感，還有如何看待自己所處的環境，這些經驗未必能直接透過提問得到答案。有時也需要閉上嘴，用身體感受與傾聽。外來者看到的可能是一片面臨海嘯威脅的低地，住在那裡的人看到的，卻可能是家、工作、親人與一輩子的生活。

人在自己的地方生活久了，反而不一定會注意道路、空間、生活習慣與人際關係，局外人的位置，可以讓我們重新看見那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這可能是地方珍貴的特色，也可能是一直沒有被發現的問題。再成為局外人，是指當我們進入田野，一定帶著自己的觀點與視野，理解當地人後，不是要放棄自己的想法，這時自己學科的方法，就能在當地人習以為常的日常，給予不同的觀點。

最後，是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我們常帶著專業走進地方，很快就看見問題，但真正的地方實踐，不是宣稱能替所有人解決困難，而是在自己的位置上，找到可以持續陪伴，又不越過他人生活界線的行動。無論是學生或教師，都能在自己可以做的位上，盡可能建立連結。

人類學的參與觀察與田野方法提供我在進行防災研究時，不是一套標準答案。而是使我在提出答案前，多問幾個問題：我站在哪裡？我是用誰的角度定義問題？我覺得好的方法，對生活在這裡的人而言，也真的是好的嗎？

這樣的提問並不只屬於人類學。Spring School 中，具有都市計畫背景的義大利 Rizzi 教授也提醒學生：任何空間規劃與政策設計，都不能只看圖面、人口與成本，還必須理解真正生活在其中的人。一項方案能不能進入地方，取決於使用者如何理解與使用空間，以及改變會帶走或保留什麼。包含我所遇到的日本工科背景的防災專家，也都會進行田野調查，開始的方式就是傾聽，先從成為當地人開始。

三、一張畫裡的答案：安全之外，人可能失去什麼？

Spring School 期間，Rizzi 教授向學生提出一個直接、也很有挑戰性的問題。日本正面對少子化與高齡化，海邊聚落人口逐漸減少，居民年齡也愈來愈高，那麼政府為什麼不提供一筆足以讓居民安度餘生的費用，協助他們搬到更安全的地方就好？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已經被我畫進當時的田野筆記裡。你看得出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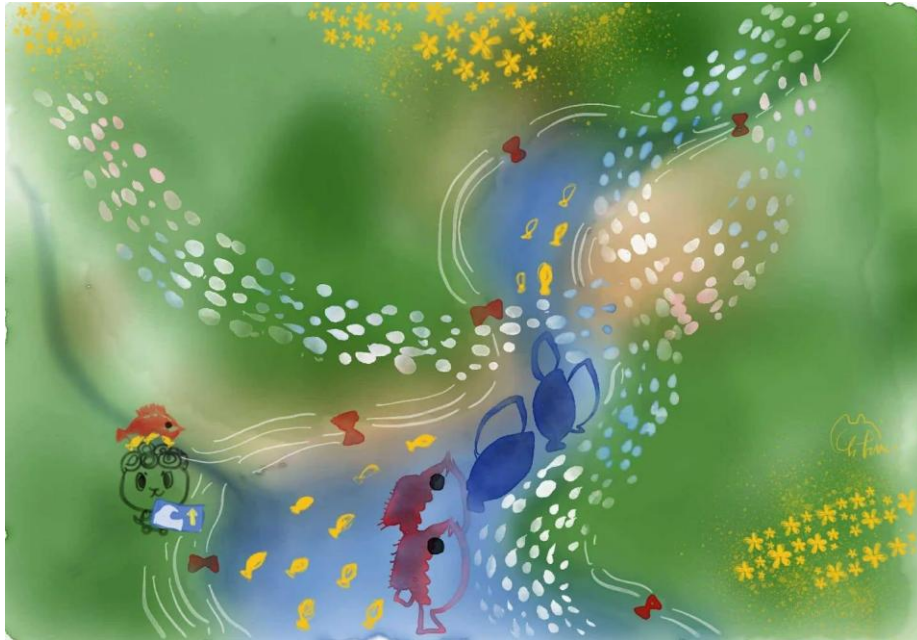


圖 1、我在須崎田野觀察時的手繪圖（林怡資會）

「因為這群人是漁夫」Rizzi 教授這樣說著，我看到同學們眼中的震驚。我的畫裡有須崎海岸、洋流與魚群、以及當地的吉祥物新庄君，我的畫裡不是一片等待海嘯抵達的危險區，而是豐富的魚產與美麗的海邊，是人與海一起生活的地方。

這片海可能具有海嘯風險。但對漁夫來說，海是工作、技術、季節、時間感與身份的一部分。在須崎，居民告訴我，生魚片是用當天捕到的魚做的。對有些地方而言，兩三天前的魚貨或許仍可稱為生魚片；但對當地人來說，這裡的魚必須是「今天的魚」。這不只是對新鮮的要求，也是一種與海、季節和漁獲節奏共同生活的方式。因此，離開海意味著離開熟悉的勞動方式、長年累積的知識、彼此照應的關係，以及自己生長的家鄉。

災害潛勢高的地區常會被外界問：「為什麼他們不搬走」，這句話便可能把居民理解成缺乏風險意識。但若從人類學與使用者的觀點再問一次，問題便會變成：他們為什麼留在這裡？海除了危險以外還具有什麼意義？如果離開，他們會獲得什麼，又會失去什麼？防災的目的當然是保護生命，但生命不只是呼吸與存活，也包括一個人能否保有熟悉的生活、關係、能力與尊嚴。對一位漁夫而言，提供足夠度過餘生的費用，或許可以解決經濟問題，卻不一定回答生活的問題。

這也正是目前防災教育在推動時必須理解使用者觀點的原因。再進步的科技以及空間規劃，都需要人的理解，若規劃只處理地理上的安全，卻沒有處理生活如何延續，即使方案在技術與財務上可行，也可能無法被地方真正接受。阪神淡路大地震與東日本大地震後的重建經驗，也提醒我們：若空間規劃未能處理人際關係與生活延續，可能造成新的疏離。這也讓我更確定，成為局內人、再成為局外人、做自己可以做的事，並不是抽象的研究口號，而是一種實踐的順序：先理解地方如何生活，再提出專業所看見的風險與可能，最後從彼此可以接受的地方開始改變。專業讓我們有能力提出方法，而理解別人，才使方法有機會真正走進生活。

四、讓交流走進實踐：從教師對話到跨世代共同參與

我與伊藤師的相遇，沒有停留在我們之間，在 2025 年高知的台日聯盟，2025 年在高知舉辦的臺日聯盟研討會中，我們進一步將兩校交流發展為防災教育主題的共同報告，也加深了與高知大學姐妹校及龍谷大學夥伴的連結。原本屬於個人的對話，開始延伸成大學、高中、國中與地方之間的關係。

2025 年，我帶著一位通識課程學生參與高知的 Spring School；同年 5 月，嘉義縣中埔國中的學生也前往高知交流。2026 年，陳皆儒院長所指導的兩位學生，與我的一位通識課程學生再次參與 Spring School，進入須崎的地方場域，也體驗、討論並設計防災遊戲。同年，嘉義縣義竹國中與豐山實驗教育學校的學生，共同參與「大手牽小手」（讓大學師生與國高中師生或小學師生共同學習的交流）計畫，彼此陪伴。今年度太平洋學園的同學們也走入埔里，認識在地的災害防救志工隊、集集國小，與紙教堂里。以防災牽起的各種世代與場域的交流就在彼此的互訪與理解和學習中共同進行。



圖 2、國中師生與高知師生在須崎避難塔上合影

大學生不再只是跟著教師參訪，而是作為工作坊的一員，逐漸成為高中生與國中生的陪伴者、文化轉譯者與學習協作者。原本由教師開啟的關係，開始

有了不同世代的位置。我們把國際交流帶給孩子們，讓孩子們出國看不同的世界，但我覺得我們真正做的，是讓孩子走進另一個地方，再回頭看見自己的地方。也讓不是平常熟悉的人事物進入自己的日常，能夠意識到自己的存在。



圖 3、大學生在 Spring school 須崎公民館發表會（林怡資攝）

五、透過學生的眼睛，看見交流真正留下了什麼

交流後的分享是學習重要的足跡，不論在中學、高中與大學，我們都看到同學的轉變。

一位參與交流的國中生在回饋中分享：「原本以為防災就是地震要做防災演練，但到了日本後，才發現大家很認真的在做防災，海嘯的避難體驗讓他感覺日本做防災的認真。」也因為和日本的學生交流，同學同能夠表達的語言進行交流，才深感學習的重點。也因為看見日本學生自己熟悉居住地，也開始思考：「我的家鄉特色有什麼？」這些回答未必直接使用「韌性」或「防災」等詞彙，卻已經顯示出孩子開始將防災與地方生活連結起來。另一位學生則提到，到了國外才有機會慢下來，感受到街道的乾淨與建築物的美，也因此回到自己家鄉才發現自己家也那麼美。。國際交流不是只讓孩子學會比較哪一個國家比較進步或厲害而已，真正的學習，是在看見別人之後，重新認識自己。

對現在的臺灣孩子而言，九二一大地震是歷史；對高知的學生而言，南海海槽巨大地震則是一場尚未發生的未來。兩地學生都面對類似的困難：如何理解自己沒有親身經歷的災害？單靠更多知識不一定足夠，但當孩子走進地方、與另一群學生相遇，聽見對方怎麼談自己的生活與風險，災害就不再只是遙遠的名詞。

大學生的成長，則出現在另一條路徑上。2026 年參與 Spring School 的學生，在須崎進行田野調查後，結合當地居民的意見，為未來圖書館設計防災遊戲。對他們而言，最困難的並不是想出遊戲規則，而是如何把訪談中聽見的地

方經驗放進設計裡；他們必須在「遊戲要好玩」與「議題不能被簡化」之間反覆調整。

回到臺灣後，學生將這段經驗帶回同年的六月的「非常防災」讀書會，以〈從高知出發：防災也能設計成遊戲？〉為題，分享田野調查、遊戲開發與交流過程中的思考。從走進地方、傾聽居民，到站出來向他人分享經驗，他們逐漸理解：防災遊戲不只是讓人記住正確答案，而是創造一個能讓不同處境、選擇與風險理解被說出來、被討論的空間。這樣的學習軌跡，正呼應了我所說的：先成為局內人，再成為局外人，最後回到自己可以做的事。



圖 4、2026 Spring school 參與師生合影

六、從活動成果到關係成果：關係也是防災的基礎設施

計畫與交流，常以活動場次、參與人數、問卷結果與學生作品呈現成果。這些資料當然重要，但這兩年的交流，也讓我看見另一種比較慢、不容易被量化的成果：活動結束後，學生還願不願意回來分享？老師是否願意討論下一次合作？地方夥伴是否願意延續這些夥伴關係？這些事情不容易放進統計表，卻會決定下一次行動是否必須重新從零開始。

2024 的開始，並沒有一張合作藍圖。我們只是共同關心防災的議題，後來的 Spring School、大學生交流、兩次國中生交流、「大手牽小手」、高中生來埔里與讀書會，都不是按計畫逐項發生，而是在信任累積之後，由一次行動帶出下次行動。活動成果回答的是：我們完成了什麼。關係成果回答的則是：事情結束以後，還有誰願意繼續走下去。

從這個角度來看，大學在地方實踐與國際交流中，不只是提供研究與資源，也在創造相遇、協助轉譯，並支持關係延續。這裡的轉譯，不只是中文、日文或英文之間的翻譯，也是在不同國家、世代、學校體制與地方經驗之間，協助彼此理解。人類學的參與觀察，不是把兩個地方放在一起排名，而是透過他者重新看見自己。日本保存災害經驗的方式，使我重新思考臺灣如何讓記憶進入日常；臺灣在災害之後迅速形成的互助，也讓我們看見另一種社會連結的

力量。

談到防災時，首先會想到設備或避難處所，這些是不可少的基礎設施。但一個地方在災害來臨是是否能有所作為，也考驗著彼此是否信任、是否曾經合作、需要時知不知道可以找誰。這些關係平時不一定看得見，卻像一條條隱形的道路，使資訊、資源與照顧可以流動。須崎漁夫的對話提醒我，安全不能只從外部定義；學生的眼睛提醒我，真正的學習不一定按老師預先設定的方向發生；伊藤師與我的相遇則提醒我，許多重要的實踐，不是從一份完美的計畫書開始，而是從兩個人願意坐下來，好好談一談開始。

當關係從教師延伸到學生，從大學延伸到中學，從臺灣延伸到高知，它承載的就不再只是一場國際交流，而是一種共同面對未來災害的能力。

關係不是防災實踐旁邊附加的溫暖故事，也不是活動結束後留下的額外成果。**關係本身，就是防災的基礎設施。**